

【比较文学与文化】

中国与周边: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

——兼论韩国近现代文学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

金柄珉

【摘要】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历经重新审视与相互认知、交叉互动与多样化发展、共同话语与深度合作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通过跨界对话与深度交流,实现了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并不断完善主体性与现代性建构。其相互译介实践,在主体与文学需求、译介路径与形式、译介倾向与影响等方面,体现了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性样态,其为共享文学理念和资源、互鉴现代性价值、推进共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韩近现代文学的跨界书写,包括同一主题共同书写和以跨界体验为主的相互书写,充分表现了跨越边界和超越文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成为中韩乃至东亚近现代文学交流中的一道风景线,尤其是以抗日为主题的中韩跨界书写,体现了中韩共同反对强权、超克帝国、实现人类和平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东亚精神,并对还原历史现场、激活历史记忆、重估东亚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中韩近现代文学;文学交流;主体性;现代性;跨界书写

【作者简介】金柄珉,文学博士,延边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韩国文学史、中韩文学比较研究。电子邮箱:bmjin@ybu.edu.cn。

【原文出处】《中国比较文学》(沪),2020.1.2~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韩近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89)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具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中韩文学交流,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代中韩两国的文学交流呈现“天朝礼治体系”大框架下的人文交流性质,具体体现为中心与周边共同发展模式、官方与民间交流并行的发展机制、资源共享与合作发展途径等总体特征(金柄珉、李存光2019:18)。纵观几千年中韩文学交流的历史,中国文学始终发挥以辐射、张力、渗透为特征的创新性价值,韩国文学则体现着以吸纳、变异、融汇为特征的本土化价值。至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关系面临重大历史转型与

价值重建,中韩关系从中心与边缘关系演变为边缘对边缘关系,经历史新阶段的碰撞、摩擦和调整,建立起了互为主体、平行多元的新型文学交流关系。两者通过互动对话、相互译介、跨界书写等多层面文学交流,开拓了两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尤其是韩国文学不断地发现自我与他者的边界,进而促进了主体性与现代性的建构。

一、对话与建构:

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及其主体性

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历经重新认知与自我发现(19世纪末至1918年)、交叉互动与价值多样化(1919

年至1936年)、共同话语与深度合作(1937年至1945年)等三个发展阶段,通过百余年的对话与交流,实现了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促进了主体性建构与文学现代性的互鉴。

重新审视与相互认知(19世纪末至1918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韩两国面临抵抗列强侵略与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中国的变法运动和韩国的爱国启蒙运动为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发展新机遇。要想建立新型文学交流关系。必须摆脱“大中华”与“小中华”意识的束缚,并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建构以主体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价值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韩文学交流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韩国近代文人朴殷植、申采浩、申圭植等通过译介梁启超的政论、文学理论、小说等著述,广泛接受了西方笛卡尔、康德、赫胥黎等近代主体性、进化论哲学思想,并积极探讨民族主体性建构。申采浩是通过梁启超的著述接受西方主体性思想的影响、且将之本土化的爱国启蒙文人。他曾围绕着主体性建构问题深刻指出:“我”有“大我”和“小我”之分,其“我”或“大我”指个体“理性”抑或民族“理性”,他进而阐明“大我一精神自我”的存在价值,还从“我”和“非我”的关系上强调“大我一精神自我”。即民族自主性和能动性(申采浩1972:84-85)。韩国的近代启蒙文人申圭植、朴殷植等人关于主体一理性的阐述,与申采浩基本一致,他们共同为韩民族主体性的建构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随着1910年韩国败亡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中韩文学交流进入新阶段,且对主体性认识有了新的发展。韩国来华流亡文人曹成焕、申圭植等经与辛亥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柳亚子等人的思想文化交流,更明确主体一理性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也对自我与他者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并通过中国体验重新发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也认识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如申圭植来华后亲自参加同盟会

和辛亥革命,慷慨解囊支援黄兴武装队伍和《民权报》,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活动,并组织以中韩革命先驱为主要成员的新亚同济社。在其主动要求下,他于1912年4月17日在上海受到孙中山接见。他曾在诗中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认同和对孙中山的无限敬仰:“共和新日月,重开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岁存”(申圭植189)。曹成焕曾这样论述辛亥革命:“中华所创之大成功,必将光耀亚洲史册,令东西强邻胆颤。”“亚洲大陆提倡自由,此为中华之大成功;唤起了半岛江山中几乎泯灭的革命思想,此亦为革命之成功。”(曹成焕627)综上所述,韩国败亡与中国革命,为韩国流亡志士的中国认知与主体性建构,为建立互为主体的中韩合作关系带来了重要契机。这一时期的中韩文学交流主要表现为:首先,韩国对梁启超等人所著中国近代政治小说的翻译;其次,中韩近代文人的跨界互动与对话,即,金泽荣、申圭植、申采浩、朴殷植等来华流亡文人与梁启超、严复、张謇、柳亚子、陈其美等的交流;再次,韩国流亡文坛的形成与义烈书写、中国体验书写的初期发展以及梁启超、郑沅、鸡林冷血生等人的韩国亡国书写等。韩国文学通过跨界交流逐步实现自我审视与相互认知,积极建构民族主体性与国家想象。

交叉互动与价值多样化(1919年至1936年)。中国“五·四运动”和韩国“三·一运动”为中韩相互认知带来更为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郭沫若等都与韩国文人有过交流,且从不同侧面充分肯定了民族主体性在韩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重要性。当然,韩国流亡文人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有普遍认同。两国文人的相互认同给中韩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以全新发展机遇。近代以前,由于受天下观(华夷观)影响,中国对韩国并不主张平等关系,也不认可其主体地位,所谓“用夏变夷”就是最好例证。当然,韩国也自称“小中华”。但自变法运动,尤其新文化运动之

后,中国对韩国的认识也有明显变化,不仅承认韩国的主体地位,而且支持韩国的抗日独立运动。

如陈独秀评价“三·一运动”的意义时说道:“我们希望朝鲜人的自由思想,从此继续发展。我们相信朝鲜民族独立自治的光荣,不久可以发现。”“有了朝鲜民族活动光荣,更见得我们中国民族萎靡的耻辱。”(陈独秀1)他不仅对韩国独立革命运动中的民族主体精神给予高度认同,而且对中国现状与民族精神有深刻反思。傅斯年也指出:“(‘三·一运动’)实在可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朝鲜人的这种精神,就是朝鲜人最后胜利的预告。”(688)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对韩国独立运动及其民族主体性的认同,直接影响到韩国文人的主体性建构以及互为主体、中韩合作意识的形成。申采浩通过中国体验和与中国文人的交流,更加牢固地树立了主体意识,严厉批判盲目追崇“主义—思想”的劣根性,强调“主义—思想”要成为“朝鲜的主义”“朝鲜的思想”的迫切性(1994:169-171)。他又说道,中韩是“真实永远之友国”,“为两国人者,能不悠然相爱,勃然相助,以共臻于同存并茁之域也兮”(申采浩2004:319、321)。他不仅坚持民族主体性,也主张建构互为主体的中韩共生共存关系。这一时期的中韩文学交流,呈现互动交叉与价值多样化的发展态势。首先,活跃在流亡文坛的韩国文人有申圭植、申采浩、赵素昂、柳子明、柳树人、金九经、金山、金奎光、金光洲等,他们的成分十分复杂,有信仰民族主义的,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同时前后信仰多有变化;他们同中国文人志士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鲁迅、胡适、郭沫若、巴金、丁玲等都有交叉互动与深度交流。其次,韩国现代文人把眼光从朝鲜转向中国文坛,从1930年代前后开始推进中国文学的翻译。相应地,中国文人也关注韩国无产阶级文学为主的新文学发展,中韩现代文学的相互译介促进了文学观念与文学形式的互鉴。再次,中韩文人共享文学资源,以亡国、移民、抗日为主题的跨界书写成为中韩文学交流的

一道风景线。

共同话语与深度合作(1937-1945)。抗战时期,中韩文人的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时期。韩国的朝鲜义勇队(军)、韩国光复军、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朝鲜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队伍分别编入中国国民军、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中国抗日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民族独立与解放,他们同中国军民一道浴血奋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柳子明在《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英勇抗战,不仅为其国家生存而战,而且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战,为人类的正义而战,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而战。我们朝鲜民族也同中国民族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奋斗!”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韩民族主体性呈现双重乃至多重特色,既是民族解放的主体,又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同时还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主体。中韩文学交流呈现共同话语与深度合作的发展态势:首先,中韩文人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在抗日旗帜下进入实质性合作发展阶段。韩国文人柳子明、李斗山、金奎光、李范夷、韩悠韩、李达、金光、金昌满同中国文人郭沫若、巴金、夏衍、田汉、穆木天、艾青、力扬、卜乃夫、刘金镛、王继贤等进行全方位的深度交流与全面合作。其次,抗日斗争成为中韩文人共同书写的主要题材。韩国流亡文人创办的刊物有;《朝鲜民族战线》(1937)、《朝鲜义勇队通讯》(1939)、《东方战友》(1939)、《韩国青年》(1940)、《韩民》(1940)等。在这些刊物上,中韩两国作家共同发表政论、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等文学作品。巴金、艾青、力扬、穆木天、卜乃夫关于韩国人的抗日斗争书写和李斗山、文明哲、李达等关于朝鲜义勇队的抗日书写以及中韩合作演出歌剧《阿里郎》(金昌满,1939)、话剧《朝鲜的女儿》(金昌满1939)、歌剧《阿里郎》(韩悠韩,1940),还有朝鲜抗日游击队的话剧《血海之唱》(1937)、《战斗的密林》(1938)等,无不体现着在“全民动员,抗日救国”旗帜下互为主体、共同抗日的中韩合作的时代精神。

二、传播与影响:文本的相互译介

到了近代以后,随着知识、思想、信息传播模式的转变,中韩文学间的传播呈现原文与译本并行传播的格局。由于自古以来汉文是中韩“共同的书面语”,汉字文本的传播仍然进行,且产生一定影响。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相互译介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和形式。翻译活动是“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之间彼此互动”(耿纪永、赵美欧210-215),近现代文学的相互译介体现了现代性理念与文学想象的互认与相互借鉴。纵观近现代中韩文学的相互译介与影响的发展史,在译介主体与文学需求、译介路径与形式、译介倾向与影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点。首先,从译介主体与社会需求看,经历了从启蒙运动思想家译介到文学家译介的过程,也经历了从政治爱国启蒙运动需求翻译到文学发展需求翻译的历史过程。清末民初中韩文学相互译介尚未形成,主要是韩国对中国文学的单向性译介。20世纪初,韩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译介主体主要是启蒙思想家,他们出于“文明开化、自主独立”的爱国启蒙运动的需要参与译介活动。如,韩国申采浩、朴殷植、张志渊、洪弼周、周时经等人,他们既是启蒙思想家,又是爱国作家。朴殷植曾在《瑞士建国志》序文中写道:“在这世界中,读此瑞士建国志,谁都会激发爱国心与救国救民之心[……]如果吾之韩国也同瑞士屹立于列强之林,加强独立自主,吾同胞之生活必定远离地狱,走向天堂,岂不乐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务必培育爱国心,举国团结一心。”(3)韩国的爱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通过对政治小说、人物传记的翻译,宣传独立自主、文明开化、内修外强的政治理念,赞美民族英雄的精神,以此呼唤民族觉醒和民族英雄的出现。韩国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翻译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对梁启超等中国启蒙文人创作的翻译,如《清国戊戌政变记》(梁启超著,玄采译,1900)等,二是对梁启超等翻译的西方作品的重译,如《罗兰夫人传》(坪内雄藏译,梁启超重译,申采浩再译,1907)、《中东战

记》(林乐知、蔡尔康中译,玄采重译,1908)等,据统计大概有30多部。而韩国对中国政治小说和英雄传记的翻译,直接为爱国启蒙运动服务,深受读者欢迎,所以不同译本有多次重刊。

至现代时期,中韩文学的翻译主体与社会需求有了新变化,译介主体主要是现代作家或文人。如中国从事韩国文学译介的有周作人、胡风、王赫、王觉、范泉、古新、刘小蕙(秋子)等;韩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的有梁建植、柳树人、丁来东、金光洵、李陆史等。可见,翻译主体基本上是经新文学运动洗礼的作家,同时,译介目的主要是为了文学本身的发展,所以译介作品多为新文学作品或者是古典文学作品。出现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一是中韩两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基本消退,新文学运动业已拉开序幕,中韩现代文学的互鉴势在必行;二是从文学的发展需要看,亟待从启蒙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批判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韩译基本囊括了现代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据初步统计,韩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约有200多部(篇),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巴金、曹禺、茅盾、冰心、熊佛西、王独清、欧阳予倩等主要作家作品。韩国现代文学中译是从1920年代开始的,所译作家包括崔曙海、林和等无产阶级文学,金起林、黄锡禹等现代派文学,梁柱东等民族主义文学。

其次,从译介的路径与形式看,中韩互译经过了外译本重译到原本直译的过程。20世纪初,中国文学韩译除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小说和人物传记外,有大量西方文本的中译本或中译改写本的韩译,前者如《越南亡国史》(梁启超中译,玄采韩译,1906)等,后者有《瑞士建国志》(席勒著,郑哲贯中译改作,朴殷植韩译,1907)等。此外还有中译本的翻案性韩译,如《铁世界》(迦尔威尼著,吴门天笑生译,李海潮改写翻译)。无论是中译本韩译还是中译改写本韩译,抑或是中译本的翻案重译,都存在重大“变异”,即改写或缩写现象,这主要与韩国启蒙文人的“政治想象

力”有关,都是出于韩译者特定动机与目的的改写和缩写。当时的韩国文坛不是没有懂日语的文人,但是留日归国文人更多地关注对日译西方文学或日本文学的韩译。相应地,韩国现代文学的中译,既有日译本的中译,还有一部分对法译本、世界语译本的中译。如,韩国无产阶级作家崔曙海的《我的出逃》(白斌译,1931)、朴怀月的《战斗》(翠生译,1926)、宋影的《熔矿炉》(白斌译,1930)、张赫宙的《被驱逐的人们》(王宙译,1933)等作品,其中大部分是日译作品的中译。还有一部分作品,如林和的散文“狱里病死的伙计”(《无产者》1929年7月号,原文为日文,白斌译,1930)、权焕的“咳,成这样子了!”(《无产者》1929年7月号,原文为日文,白斌译,1930)等,这些作品原是以日文发表在日本进步刊物上的。又如,《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胡风编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朝鲜短篇小说集》(王赫编,新京新时代社,1941)这些基本上是日译本的中译。另外,刘小蕙的《朝鲜民间故事》是法译本的中译,叶君健的《被驱逐的人们》是高木宏世界语译本的中译(叶君健109)。30年代出现了对韩语文本的直接翻译,如《火线上的朝鲜义勇队》(刘金镛编译,1939)、《抗日战线上的朝鲜义勇队》(王继贤编译,1939)、《朝鲜现代童话集》(邵霖生,1936)、《朝鲜童话》(吴藻溪,1936)等。这一时期来华韩国文人的翻译活动十分引人瞩目,包括丁来东、金灿等,他们既是中国文学的韩译文人,又是韩国文学的中译文人,是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履行双重使命的“特等双枪手”。

中韩近现代文学的互译还包括相互文学批评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的翻译,其中韩国文人对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的翻译尤为引人注目。被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评论有胡适:“最近五十年的中国文学”(梁建植译,《东亚日报》1923-8-26)、“胡适氏的文学革命论”(原文是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允宰译,《东明》二卷,第16-19号,1923-4-22至5-6)、章炳麟:“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问的发达”(梁建植

译,《东亚日报》1929-1-19)、钱杏邨:“中国文坛的回顾”(金光洲译,《朝鲜日报》1931-3-28至4-1)、何王波:“中国女流作家论”(金光洲译,《东亚日报》1939-3-29)、郑伯奇:“中国新剧运动的进路”(金光洲译,《中央日报》1931-12[14-16])、马彦祥:“现代戏剧与戏剧家”(金光洲译,《戏剧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年。1-24页)等,这些翻译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坛、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经验起到重要的作用。

再次,从译介的相互接受与影响看,经过了从启蒙主义文学的互鉴到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互鉴。比如,韩国在近代时期通过对中国政治小说的翻译,接受了中国乃至西方的启蒙主义,到现代则和中国相互借鉴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文学创作。韩国现代文学的中译在中国文坛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韩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思想进步、形式新颖,给中国文坛注入了新鲜空气。胡风对韩国新文学作品给予很高评价:“朝鲜底新文学运动比中国的要早十年,不但产出许多新进的作家,而且还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流派。”(1)尽管韩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数量不多,但确实备受关注。如旅日韩国青年作家张赫宙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译成中文,有的作品还以多种译本问世。这些韩国现代文学的译介研究有助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内涵和特殊性的认识”(宋炳辉56)。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韩译对韩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其中包括梁启超、鲁迅、胡适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郭沫若的小说和诗歌及历史剧,曹禺和阳翰笙的话剧,冰心等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等。其中,尤以梁启超、鲁迅的韩译在中韩文学译介与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梁启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构启蒙文学理论和启蒙现实主义文学方面,而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构文学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方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对韩国的影响超乎

人们想象,甚至不亚于在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近代对韩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梁启超创办的刊物和《饮冰室文集》传播到韩国后,掀起轩然大波,70多篇(部)著述,或刊登在启蒙报刊,或以单行本出版,其中译成韩文的也不少,且影响广泛。梁启超的著述在韩国一度被推崇为“爱国圣书”。首先,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韩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朝鲜的爱国启蒙思想家申采浩、朴殷植、张志渊、玄采、周时经等都翻译过梁启超的理论文章和小说作品,从中受到启发后各自撰写文章推动近代韩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998)、“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等在韩国产生广泛影响。“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1902)的“小说界革命”思想,对韩国文人来说的确耳目一新。申采浩发表“论小说家的趋势”“近今小说著者注意”等文章,大声疾呼韩国小说之革命,他提出“小说是国民之罗针盘”“小说是国民之魂”的观点,也提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和审美特征,这些显然受到梁启超的小说理论的影响。与此同时,韩国启蒙文人翻译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戊戌政变记》《罗兰夫人传》《匈牙利爱国葛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这些政治文学作品在韩国社会和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且在其影响下韩国文人也创作了《李舜臣传》《乙支文德》《崔莹传》《自由钟》《禽兽会议录》《梦潮》等一系列政治小说。其次,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口号也对韩国近代诗歌的转型起到重大作用。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指出“支那非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189)。韩国的近代文人也对中国的“诗界革命”口号很快做出反应,积极推进国语诗歌的改革。如申采浩在《天喜堂诗话》一文中,提出“因此称其为支那诗界革命尚可,然不可称其为东国诗界之革命乎?‘何谓东国诗乎?’曰‘以东国语、东国文、东国音创作的诗歌是也’,‘称何人为

东国诗之革命家乎?’曰‘以新的手法创作东国诗者是也’”(2006:736)。从上文可以看出,申采浩是明显受到梁启超“诗界革命”之影响,但他特别强调民族语言诗歌的发展。韩国的近代诗歌固然深受日本新诗形式的影响,但决不可忽视中国“诗界革命”的影响,韩国爱国启蒙文人身体力行,推进国语诗歌的变革,以推动新诗的现代转型,同时,梁启超的译介思想与活动也对启蒙期韩国文坛给予重大影响。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先驱和主将,从《狂人日记》问世到现在,一直在韩国文坛备受关注,而且,其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辐射与影响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作家不可比拟的。同鲁迅进行交流的韩国现代文人有吴相顺、柳树人、李又观、金九经、李陆史、申彦俊等,他们都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来华韩国青年文士。通过交流,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文学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而鲁迅先生也对殖民地弱小国家予以了更大的关注。如,鲁迅1919年在《一个青年的梦》(剧本,武者小路实笃著)的译者序文中围绕韩国问题,就深刻批判了中华中心主义(195)。1933年5月22日,鲁迅在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要求韩国文人把韩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文坛,也同意为韩国杂志《新东亚》撰稿,以此表示对韩国乃至韩国文学的关注和支持。从1927年《狂人日记》(柳树人,1927.8)的翻译到1946年《鲁迅短篇小说集1.2》(金光洲、李容珪,1946)的出版为止,前后20多年鲁迅一直是被韩国文坛持续关注中国现代文豪。韩国不仅翻译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及杂文,而且也做批评与研究。

鲁迅作品译介对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鲁迅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作品影响了一批韩国现代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如朱耀燮、金光洲等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对现实的深刻批判和下层人物性格塑造;申采浩的随笔(杂文)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辛辣、幽默的讽刺风格;李陆史诗歌中不屈不

挠、坚韧不拔、永不妥协的意象等都深受鲁迅文学的影响。其次,通过对鲁迅文学的译介活动,推动韩国现代文学中的译介文学的发展。在现代韩国译介文学的发展中,对鲁迅文学的译介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看,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其他作家都不可比拟的,但从评论的角度看,通过鲁迅的研究和评论能够看到域外文人的特殊视角和方法,即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之价值的独特分析。其中,丁来东的“鲁迅和他的作品”和李陆史的“鲁迅追悼文”不仅代表韩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水准,而且与同时代中国的鲁迅研究相比较也毫不逊色,且显现出独特的视角。如丁来东通过对鲁迅《野草》的细读和研究,发现鲁迅的沉闷与静观的精神所在,并高度评价“‘野草’是鲁迅全部艺术的结晶品,也是其思想的总结算,最正确的批判人生社会,最能体现隐退的温情,最正确地阐明鲁迅的希望和艺术态度”(348),进而深入阐释其作品与苦闷的深层关系。又如,李陆史通过对鲁迅的研究指出:鲁迅不做小说创作有其历史的和自身的原因,即有“比起写作更忙于逃难”(88)的情结,带引号的这种比喻是对1926年以后鲁迅文学境遇的形象描述(洪昔杓20)。总之,鲁迅文学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使得韩国文学坚定了民族文学的方向,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1947年10月,鲁迅纪念演讲会在首尔举行,从此,鲁迅的研究进入大学课堂,使得韩国的鲁迅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互动认知与跨界书写

中韩近现代文学中的跨界书写包括共同书写和相互书写。共同书写包括中韩文人对同一主题(以韩国、韩国人的亡国、抗日、移民等为主要题材)的文学创作。以韩国的亡国为主要题材的有:中国梁启超的《朝鲜哀辞24首》(1910)、黄遵宪的《朝鲜叹》(1910)、世次郎(黄世仲)的《朝鲜血》(1910)、倪轶池、庄病骸的《朝鲜痛史·亡国影》(1915)、鸡林冷血生的《英雄泪》(1910)、郭沫若的《牧羊哀话》(1919)、侯曜的《亡国哀曲》(1931)、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1936)等,

韩国申采浩的《此日》(1912)、《你的》(遗稿)、《蝉之歌》(遗稿)、金泽荣《追感本国十月之事》(乙巳)、申圭植的《发汉城渡鸭绿江》(1911)、《韩国魂》(1920)、李范晋《绝命词》(《南风报》,1911-7-10)等。1910年韩国亡国前后出现的中韩亡国书写作品,在批判日本侵略和韩国卖国贼的罪状等方面基本一致,但有着一定的差异。如梁启超等的朝鲜亡国书写作品有对韩国的亡国表现出同情和惋惜,也有对封建王室的无能及奸臣卖国行为的批判,但对日本的朝鲜侵略尚缺乏批判和愤怒,尤其是像伊藤博文这样的历史人物被描写成英雄的作品也较多,即“双雄并举”,暗喻“中国无此栋梁材”(吴敏49-50)。中国作家的创作对朝鲜历史事件和人物方面虚构与改写较多,尚缺乏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这与近代中国文人对日本及韩国的近代历史不甚了解有关,也与作家的创作动机有所关联,他们多出于激发中国人觉醒的目的,因此,对这些作品的“虚与实”应进行思想和美学的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文人对韩国主体地位的认同和逐渐识破日本帝国的侵略本质,在郭沫若等新文学作家的亡国书写中,前述“双雄并举”的现象已基本消退。又如,前面所列韩国人的亡国书写作品,对亡国表现出极大的痛苦以及对侵略者的愤怒,但对抗日救国的方略尚不明确。

另一类主题的作品是反映韩国移民生活,包括:中国李辉英的《万宝山》(1933)、骆宾基的《边陲线上》(1939)、戴平万的《流浪人》(1929)等;韩国有崔曙海的《饥饿与杀肉》(1925)、《红焰》(1926)、金东仁的《赤山》(1936)、李泰俊的《农军》(1939)、安寿吉的《稻子》(1944)、白石、金朝奎等的诗歌等。这些中韩移民书写作品在表现移民者的生活苦难和肯定拓荒精神等方面有共同点,但也有一定差异。以“万宝山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为例,李辉映的小说《万宝山》(1933)是“阶级意识克服了民族意识”(茅盾346),而李泰俊的小说《农军》(1939)则回避了日本人制造民族矛盾的

事实。又如,安寿吉的《稻子》(1944)尽管客观地反映了汉族、朝鲜人及日本警察的复杂关系,但缺少对日本警察的批判。另外,韩国作家的移民书写作品明显地表现出身份认同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帝国话语与殖民话语的影响分不开,因此,中韩作家的移民书写尚需以跨文化的视角展开深入的比较研究。

在同一主题的跨界书写方面最多且最能体现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的作品,是抗日主题的文学创作。中国作品主要有严复的《朝鲜烈士传》(1910)、陆恩煦的《李范晋传奇》(1911)、郑沅的《安重根》(1919)、蒋光慈的《鸭绿江上》(1926)、台静农的《我的邻居》(1928)、潘子农的《尹奉吉》(1932)、冯玉祥的《尹奉吉》(1934)、力扬的《朝鲜义勇队》(1939)、巴金的《发的故事》(1936)、《火》(1940)、郭沫若的《朝鲜义勇队》(1946)、艾青的《悼词——献给反法西斯斗争中殉难的朝鲜烈士》(1942)、卜乃夫的《韩国的愤怒》(1941)、《露西亚之恋》(1941)、《北极风情画》(1943)、《骑士的哀怨》(1942)等;韩国的主要作品有朴殷植的《安重根传》(1915)、赵素昂的《金相玉传》(1925)、《遗芳集》(1932)、申采浩的《梦天》(遗稿,1916)、《龙和龙的对激战》(遗稿,1928)、金山的《奇怪的武器》(1932)、金光的《尹奉吉传》(1933)、《火线上的朝鲜义勇队》(朝鲜义勇队创作,刘金镛编译1939)、《阿里郎》、《朝鲜的女儿》(朝鲜义勇队创作,1939)、《血海之唱》(1937)、《战斗的密林》(朝鲜抗日游击队创作,1938)、李陆史的《旷野》(1936)、李斗山的《你是英勇的战士》(1939)等。这些作品最能体现互为主体、共生共存、中韩合作抗日的东亚的精神价值。

不难看出,抗日义烈斗争和抗日武装斗争是中韩文人共同关注的主要题材,而通过文学创作呼唤抗日斗争意识,展现了中韩互为主体、共生共存的时代精神。其中,中韩文人对韩国义烈英雄安重根、尹奉吉的书写最为突出,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散文等

多种体裁。据初步统计,以安重根为主人公的中韩抗日书写达100多部(篇),以尹奉吉为主人公的中韩抗日书写达50多部(篇),其最能反映共享资源、共同书写的中韩文学交流的跨界性与现代性特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韩国抗日斗士为主人公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其创作经历了从写义烈殉国志士(《安重根》《尹奉吉》)到写抗日战争中的抗日斗士(《发的故事》《火》);从写英雄的革命精神(《朝鲜义勇队》)到写英雄的自由爱情与人类的普遍精神价值追求的发展过程(《露西亚之恋》1941,《北极风情画》,1943)。概而言之,同一主题书写既是共同命运的革命书写,又是互补与互证的历史书写,更是人类普遍价值与追求的文化书写。

相互书写,或曰双向书写,即指跨界体验书写。主要游记作品有:中国魏建功的《侨韩琐谈》(1927-1928)、廖世承的《游东杂感二·朝鲜之一瞥》(1928)、付景堂的《游朝鲜教会记》(1927)、露存的《南满朝鲜铁路旅行记》(1926)等;韩国的游记作品数以千计,代表性的作品有:柳子明的《赤色的悲痛》(1927)、丁来东的《北京印记》(1936.9)、崔南善的《千山游记》(1942)、韩雪野的《燕京的夏天》(1940.8)、姜敬爱的《离开间岛有感》(1932)、金光洲的《春天·上海》(1935)等。中国和韩国游记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现实的批判,部分韩国文人的中国游记反映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以及对近代民主革命的憧憬。从中韩现代主体性建构的历史发展看,这些作品体现了一种对东方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也是对帝国强权和文化霸权的反思与批判。除了游记作品之外,韩国的中国体验作品更多,主要诗歌有:申圭植的《祝孙总统中山》(1912)、《南社初会致柳亚子》(1915)、沈熏的《北京的乞人》、皮天得的《1930年上海》(1930)、朴世永《北海与煤山》(1930)、《扬子江》(1931)等;小说有朱耀燮的《人力车夫》(1923)、《杀人》(1925)、金光洲的《从北京来的老头》(1931)、《长发老

人》(1933)等。韩国作家的中国体验书写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的命运描写,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人的中国革命书写,如,金泽荣、申圭植、曹成焕、柳子明、金山、朴世永、李斗山以及朝鲜义勇队和抗日游击队的文学作品等,通过中国体验书写,表现了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同和东亚和平思想,其对来华流亡文人的中国认知和中韩合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之,中韩跨界书写是近现代中韩文学交流独特的互动与对话、互补与互证。中国的语境、中国的体验确实为韩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即韩国现代文学书写空间的拓展、书写形象与风格的世界化、现代文学思潮的借鉴以及国家想象的建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跨界书写的内容、形式和方式无疑充分反映了互为主体、共同发展的时代精神。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跨界书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古代使节的来华行记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即反映了互为主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对资本主义国家想象的继承与颠覆的双重特性。

结语

综上所述,韩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是复杂的,其内容也呈多重性结构,既有启蒙现代性的建构,又有克服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探索。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为两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互动与对话的平台,而中国语境是对韩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有效促进。韩国文学在通过与中国文人乃至中国文学的对话发现自我一主体的同时,也发现了他者一主体,进而树立互为主体、双重主体乃至共生共存的中韩合作意识。通过中韩文学交流,尤其是韩国文人通过中国的体验,发现了中国的现代精神和价值,并从中发现了东亚的曙光。同时,韩国文学的社会现代性——国家想象同中国的语境有着直接的关联,尽管这种关系是复杂而多重的,既有资本主义,

也有社会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但对于韩国人来说,民族独立、光复祖国是第一目标。中韩文学交流为韩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提供了最广阔的平台。梁启超、鲁迅的文学精神和创作实践对韩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通过韩国文学的发展也可以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现代精神,包括梁启超、鲁迅精神的东亚价值和历史意义。资源共享和跨界书写为中韩现代性建构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平台,以共同书写和相互书写为特征的跨界书写是为实现多方合作、超克帝国强权、建构命运共同体的革命性书写。通过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中的人际对话、相互译介、跨界书写而获得的韩国文学的主体性、国家想象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等,无疑是韩国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表征,又是韩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途径和模式。

参考文献:

- [1]陈独秀:“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每周评论》14,1(1919年):2。
[Chen, Duxiu. "Thoughts on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chao xian du li yun dong zhi gan xiang). Weekly Review 14, 1 (1919): 2.]
- [2]曹成焕:“写给安昌浩的信”,《岛山安昌浩全集 第2卷 书函2》,岛山安昌浩先生纪念事业委员会编。首尔:东洋印刷株式会社,2000年,624-631页。
[Cho, Sung-hwan. "To Alan Chang-ho". The Complete Works of Dosan Ahn Chang-ho. Ed. Dosan Ahn Chang-ho Memorial Foundation. Seoul: Dongyang, 2000. 624-631.]
- [3]丁来东:“鲁迅和他的作品”,《朝鲜日报》1931年1月13-17日;《丁来东全集》1。首尔:锦江出版社,1971年,297-362。
[Chung, Rai-dong. "Lu Xun and His Works". The Chosunilbo, January 13-17, 1931. The Complete Works of Rai-dong Chung I. Seoul: Kun Sung Press, 1971. 297-362.]
- [4]傅斯年:“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新潮》第1卷第4号, Apr 1. 1919: 687-688。
[Fu, Sinian. "New Lessons from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chao xian du li yun dong zhi xin jiao xun). Xinchao 1, 4(April 1, 1919): 687-688.]

[5]耿纪永、赵美欧：“‘新翻译理论’何为？”，《中国比较文学》2(2019):210-215。

[Geng, Jiyong and Zhao Meiou."What is the New Translation Theory"(xin fan yi li lun he we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2(2019): 210-215.]

[6]洪昔杓：《鲁迅与近代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出版社，2017年。

[Hong, Seuk-pyo. Lu Xun and Modern Republic of Korea. Seoul: Ewha Womans University Press, 2017.]

[7]胡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Hu, Feng. Shah Ling-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of Korea and Taiwan(shan ling · chao xian tai wan duan pian xiao shuo ji). Shanghai: Cultural Life Publishing House, 1936.]

[8]金柄珉、李存光：“文明对话：中韩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9):17-25。

[Jin, Bingmin and Li Cunguang."Conversation of Civilizations: History and Prospect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East Asia with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for a Case Study"(wen ming dui hua zhong ban ren wen jiao liu de li shi yu zhan wang).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4(2019): 17-25.]

[9]——：《“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Korea" Series(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yu han guo zi liao cong shu). Yanji: Yanbian University, 2014.]

[10]李陆史：“鲁迅追悼文”，《朝鲜日报》，1936-10(23, 24, 25, 27)。《李陆史全集》。首尔：新文社，1986.207-221。

[Lee, Yuksa."Lu Xun's Eulogy". The Chosunilbo 23 Oct. 1936. The Complete Works of Lee Yuksa. Seoul: Xinhua News Agency, 1986. 207-221.]

[1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界》1号，1902-10-15(1-8)。

[Liang, Qichao."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s and Mass". Fiction World Vol.1, 1902-10-15: 1-8.]

[12]——：“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85-196。

[——. A Travel to Hawaii(xia wei yi you ji). Works of Liang Qichao, Vol.2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185-196.]

[13]鲁迅：“译者序二”，《鲁迅全集10·译文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95。

[Lu, Xun."Translator's Words 2"(yi zhe xu 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10.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195.]

[14]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三部长篇小说：《齿轮》《义勇军》《万宝山》”，《文学(上海1933)》1卷2期，7(1933): 340-346。

[Mao, Dun."The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fter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Chilun, Yiyongjun, Wanbao Mountain"(jiu yi ba yi hou de fan ri wen xue: san bu chang pian xiao shuo: chi lun, yi yong jun, wan bao shan). Literature(Shanghai) Vol.1 No.2, 7 (1933): 340-346.]

[15]朴殷植(译)：《瑞士建国志》。首尔：大韩每日申报社，1907年。

[Park, En-sik, trans. Wilhelm Tell. Seoul: Daehan Maeil Shinbo Publishing House, 1907.]

[16]柳子明：“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朝鲜民族战线》4(1938-5-25)。

[Ryu, Ja-myeong."Welcoming the World Student Federation Delegation", Korean People Front No.4, 25 May.1938.]

[17]申采浩：“天喜堂诗话”，《丹斋申采浩全集·第7卷》，丹斋申采浩全集编纂委员会编，独立纪念馆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所发行，2006年，469-485。

[Shin, Chaeho."Cheonheedangsihwa". A Complete Works of Danjae Shin Chae-ho Vol.7. Ed. Codif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Danjae Shin Chae-ho,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Independence Hall of Korea, 2006.469-485.]

[18]——：“大我与小我”，《改订版丹斋申采浩全集·下》，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首尔：萤雪出版社，1972年，83-87。

[——."Dae A(I) wa So A(I)". A Complete Works of Danjae

Shin Chae-ho · 2, Ed. Danjae Shin Chae-ho Memorial Foundation. Seoul: Hyungseul Publishing, 1972.83-87.]

[19]——:“韩汉两族之宜加亲结”,《丹斋申采浩的天鼓》,崔光植译注,首尔:亚研出版部,2004年,319-324。

[——:“Korea and China need a New Cooperation”. Danjae Shin Chae-ho's Tienku. Trans. Choi Kwang-sik. Seoul: A-yeon Publishing House, 2004.319-324.]

[20]——:“朝鲜的志士”,《申采浩文学遗稿选集》,金柄珉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69-173。

[——:“Korean Patriots”(chao xian de zhi shi). The Selected Literary Manuscripts of Shin Chae-ho Ed. Jin Bingmin. Yanji: Yanbian University Press, 1994.169-173.]

[21]申圭植:“祝孙总统中山”,《申圭植诗文集》,金东勋、李先汉等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189。

[Shin, Kyu-sik."Congratulations to President Sun Yat-sen"(zhu sun zong tong zhong shan). A Collection of Shin Kyu-sik's Poems and Essays. Eds. Jin Dongxun, Li Xianhan et al.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1998.189.]

[22]宋炳辉:“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3期,54-70。

[Song, Binghui."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Literatures of Marginalized Countries and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ruo xiao min zu wen xue de yi jie yu zhong guo wen xue de xian dai x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2 (2002): 54-70.]

[23]吴敏:《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朝韩书写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Wu, Min. A Study on Korean Writ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20 shi ji zhong guo wen xue de chao han shu xie yah jiu). Beijing: Law Press, 2012.]

[24]叶君健:“被驱逐的人们”,《申报月刊》3卷6号,1934年第6期,109-124。

[Ye, Junjian."Deportees"(bei qu zhu de ten men). Shenbao Monthly Vol.3 No.6, 6(1934): 109-124.]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Modernity of

Korea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Jin Bingmin

Abstract: The exchange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Korean modern literature have undergone three different stages, which are the period of re-evaluation and re-recognition(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1918), the period of interaction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from the 1920s to 1936) and the period of common discourse and profound cooperation (from 1937 to 1945).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the two literatures have completed their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therefore establish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unity and modernity. The bidirectional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Korean counterpart have well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al form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period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literary needs, methods and modes, tendency and influenc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ring literary concept and resource, realizing its complementation, and achieving mutual development. The cross-boundary writing of Chinese and Korean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consists of the joint-writing activities on the same theme as well as mutual writing for cross-boundary experience, reflects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both in crossing the boundary and transcending cultures.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and Korean cross-boundary writing with the anti-Japanese theme embodies the spirit of fighting hegemony and imperialism and achieving peace of the mankind before the mid-20th century in East Asia, which i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in restoring history, activating memory and re-evaluating the East Asian spirit.

Key words: Chinese and Korean modern literature; literary exchanges; subjectivity; modernity; cross-boundary writing